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4卷第3期
(总第12期)
2006年9月

主编: 闵维方; 副主编: 丁小浩 闫凤桥;

编辑: 岳昌君 朱莹莹

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初探

刀福东*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文章以一个傣族村寨为样本分不同模型计算了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 结果表明以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很低, 但以信息获得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此外, 在是否参与赌博为代表的社会收益率方面, 教育年限的作用不显著, 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对是否参与赌博有正的影响, 而信息获得水平的影响却是负的。在研究结果基础上, 文章最后给出了几条政策建议。

关键词: 傣族; 人力资本投资; 收益率

On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for Rural Ethnic Minority of the Dais

Fudong Dao

(Educational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is essay calculates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for rural ethnic minority of the Dais by using different modes in the case of a Dai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s very low when human capital is measured by education, but it is higher when human capital is measured by information obtained. Meanwhile, employing whether or not a person will participate in gambling as an indicator for social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years of educ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odds ratio of participation in gambling, where educational degree higher than junior school does have positive effect, but information obtained has passive effect on the odds ratio. The essay also brings out some potential policy sugges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Key words: The Dai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Rate of Returns

* 作者简介: 刀福东(1979--), 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感谢丁小浩教授和岳昌君博士为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建议, 作者对其中的疏漏负责。

一、引言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最近的一系列发展规划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逐渐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在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不仅需要进行大量的物质资本投入,而且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为这样才能从“输血式”的发展转变为“造血式”的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变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主要的形式理应在加快民族地区发展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教育做了大量投入,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仍然十分落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教育中的逃学、辍学等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已有研究从历史、文化、地区差距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1]为加快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作为理性决策单位的个人或家庭在进行教育选择的时候也必然会考虑到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早期的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收益率偏低,但是近期的研究却发现这种状况已经逐步改变。^[2-3]国内有研究者把对我国教育收益率研究的结果总结为教育收益率超过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边际收益递减、落后地区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发达地区收益率、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竞争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高于非竞争部门等,^[4]本文在此不再具体赘述。有文献指出,早期对我国农村教育收益率很低甚至为负,到现在为止农村教育收益还处于较低水平。^[5]尽管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专门研究少数民族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文献却还比较少见,鉴于傣族教育在少数民族教育中较为落后这一现实,^[6]本文以云南某傣族村寨为例来对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数据和变量

为研究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研究者于2006年冬季以云南省某傣族村寨为典型进行了入户调查,样本中一共包含了全村90户家庭共271名劳动人口。因为研究者对该村寨十分熟悉,而且数据由研究者亲自进行访谈和登记,因此数据可信度较高。数据中包含的主要变量有反映劳动者经济状况的2005年家庭总收入和个人收入,反映个人人力资本特征的教育年限、教育程度、信息获得等,反映家庭生产投入的土地量、劳动力数量以及反映个人背景的信息的变量如

性别、年龄、就业行业等。此外,如果考虑到社会也通过各种途径参与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一特殊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应该包含它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如降低生育率、减少犯罪、减少抽烟酗酒等不良习惯、改善社会风气等方面。考虑到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基本落实,而少数民族地区抽烟、喝酒是一种普遍的风俗文化,本文把劳动者是否参与赌博作为衡量社会收益的变量。

就因变量而言,由于农村经济生产的复杂性和该村村民没有记账的习惯,要准确获得其收入是较为困难的。为此,本研究将农村家庭的收入根据该村的主要经营项目分为五大类加总而得,它们分别是家庭的粮食收入(按当地粮食局收购价格折合现金)、经营收入(主要是到集市卖一些农产品的收入)、饲养收入(主要是通过卖家畜、家禽获得的收入)、工资收入(包括非农劳动人员工资和农民替他人劳动获得的报酬)和其他收入;个人收入是将家庭收入按照户主对家庭成员对家庭收入贡献大小估算的百分比的折合值;是否经常参与赌博是在入户调查过程中对劳动者直接询问登记的,按照被访者的回答建立虚拟变量,1为是,0为否。

在自变量方面要突出说明的是教育程度、行业、生产投入、信息获得和是否经常看电视等几个变量。因为该村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3人,16个接受了中专或高中教育,因此将教育程度归为四类,分别是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和初中以上。所有劳动者中有12名中小学教师、2名乡镇公务员、1名为农村信用社职员,其他全部为农民,所以为简单起见将就业行业分为非农行业和农业两类。该村农业生产活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器设备,因此劳动力是必需的投入要素之一,如果劳动者在15岁以前就停止上学则其工龄从15岁起开始算,若15岁后还在上学的则用其年龄减去教育年限后再减去上学时的年龄来计算;此外土地份额是该村农业生产投入最好的代理变量,因为该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按个人划分,尽管后来各个家庭均有生育、分家和婚丧嫁娶等行为,但原来家庭的土地份额保持不变,而且原来分配土地的都经过优劣搭配后才分给个人和家庭,所以土地在质量方面相对均衡,后来也很少因为出现大规模交换、买卖和开垦土地而出现规模效益。

尽管把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最主要的内容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已经被众多研究者所采纳,但人力资本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本文也把信息获得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进城次数和是否经常看电视为信息获得的

代理变量,原因是该村距离县城较远且交通极为不便,到县城仅仅往返交通费用就需要30元,再考虑到语言和生活范围的相对封闭性,他们无事一般不会进城。但是最近几年有一些变化,他们逐渐发现自己的农产品在城里能够得到更高的价格和有着更大的市场,所以近年进城卖农产品的人逐渐增多。尽管进城卖农产品本身是为了获利,但是这本身也代表了进城者获得了进城能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信息,而且谁也不可否认农民进城能捕获到有利于他们生产的相关信息,比如发现价格更高的农产品、看到性价比更高的农药和化肥、购买外地幼苗或种子、掌握更好的讨价还价本领、了解现代经济的特点等,来年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决策以增加自己的收益,因此采用进城次数作为信息获得水平的代理变量应该具有较高的效度。具体办法是询问劳动者在2005年一年内进城的次数并以此建立虚拟变量,小于10次为0,大于或等于10次为1。此外,电视是农村家庭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窗口,本文还把是否经常看电视以获得信息业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之一,表一总结了几个主要变量的初步信息。

表一、变量概况

变量 性别	平均教育 年限(年)	平均年收 入(元)	非农劳动 者	初中以上教 育程度者	经常与赌 博者	样本量
男性	7.13	4249.87	10	11	34	156
女性	5.49	3285.39	5	8	6	115
总体	6.44	3840.59	15	19	40	271

三、计量模型

计算教育收益率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内部收益率;其二是明瑟收益率。内部收益率法计算教育收益率对数据要求较高,在实际中很难得到符合要求的数据。明瑟假定在一个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以教育和工作经验衡量的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分配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可以将教育和工作经验对收入进行回归而得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由于明瑟收入函数的经济含义清晰、计算简便、对数据要求较低且便于进行各种比较,在目前的文献中一般采用明瑟收入函数来计算教

尽管是否外出打工可能是影响傣族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本研究却没有将此变量纳入研究视野。原因之一是该村外出打工者仅有8人(女性5人,男性3人),年龄均在25以下,因为教育程度较低(6人初中毕业,2人小学毕业),他们外出打工的地方均为经济落后的周边州、县,从事的工作多数为小餐馆服务员或杂役,所以估计打工者收入不会比在家从事劳动收入更高;原因之二是打工者打工时间不稳定,一年中可能只有几个月在外打工。在所有对打工者家庭进行调查的时候,没有一个家庭报告打工者回乡带回来他们的打工收入——大概在城市里花光了。因此,在本研究中没有包含外出打工者。

育收益率。考虑到影响收入的因素很多,后人在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时候还可以在方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行业等变量,因此,本文建立如下傣族收入的回归模型:

$$\ln Y = \alpha + \beta S + \gamma \text{EXP} + \delta \text{EXP}^2 + \sum \gamma_i X_i + \epsilon \quad (1)$$

在模型(1)中, Y 表示个人收入, S 表示可以按正规教育年限或教育程度衡量的教育水平, EXP 表示工作年限, X_i 表示影响收入的其他因素, ϵ 为随机扰动项,各个希腊字母为回归系数。其中 β 表示教育收益率,当 S 代表教育年限时它表示多接受一年教育带来收入变化的百分比,当 S 表示教育程度时, β 表示的是与基组相比某级教育的收入的级差效应。其它回归系数意义与此类似。

由于农村的生产生活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各个家庭成员的收入很难精确地从家庭的总收入中剥离出来。因此,在研究傣族农村教育收益率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农村生产的这一特点。为此本文以下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模型:

$$\ln Y = \alpha + \beta S + \sum \gamma_i X_i + \epsilon \quad (2)$$

其中 Y 表示家庭总收入, S 表示教育年限向量(包含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或户主受教育年限), X_i 表示其它可能影响家庭收入的变量(主要包括是否有非农人员、男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家庭土地份额等),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相似。

考虑到是否参与赌博是一个二元选择问题,为避免线性回归的不足,建立如下 Logistic 回归方程用以考察人力资本变量和其他变量对是否参与赌博的影响:

$$\ln Y = \ln [P / (1 - P)] = \alpha + \beta S + \sum \gamma_i X_i + \epsilon \quad (3)$$

方程(3)中, P 为劳动者参与赌博的概率, Y 为是否参与赌博的概率比, S 为教育年限, X_i 为可能影响参与赌博的其他变量。回归系数 β 表示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增加可以使 Y 变化 β 单位。但在 Logistic 回归中,由于回归系数与概率的非线性关系,人们通常用发生比率(odds ratio)来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发生比例的变化,发生比为 $\exp(\beta)$,它表示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将导致因变量发生概率上升 $\exp(\beta) - 1$ 倍,具体解释可见下文,其他回归系数的解释与此相同。

在计算以户为单位的教育收益率的时候,人们一般采用改造后的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来计算,回归方程是个双对数模型。在本研究中因为分类变量,故而采用但对数模型。

四、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在对数据和模型的初步分析中我们发现第二个模型即以家庭收入为因变量的模型中,户主教育程度和家庭劳动力平均教育程度高度相关,户主工龄也和劳动者平均工龄高度相关,在回归的过程中出现了多重共线性,为此我们删除了第二个模型中的户主受教育年限和户主工龄。删除引起多重共线的变量以后,对所有方程进行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和条件病态指数检验表明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条件病态指数均小于10,多重共线性已经得以消除。^[7]把调查数据代入定义好的模型,我们就可以得出各个模型的回归系数(表二),通过观察各个模型决定系数R²表明回归模型对样本拟合程度较好。

表二、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a	模型 1b	变量		模型 3a			模型 3b	
					变量		Exp()		Exp()
常数项	2.636** (0.070)	2.705** (0.065)	常数项	8.361** (0.411)	常数项	-2.001 (1.022)	0.135	-0.849 (1.088)	0.428
教育年限	0.015* (0.006)	—	家庭劳动者平均教育年限	0.042 (0.025)	教育年限	0.185 (0.098)	1.203	—	—
小学	—	0.031 (0.038)	小学	—	小学	—	—	0.154 (0.853)	1.166
初中	—	0.019 (0.046)	初中	—	初中	—	—	0.213 (0.895)	1.238
初中以上	—	0.349** (0.077)	初中以上	—	初中以上	—	—	2.521* (1.1)	12.436
工龄	0.035** (0.004)	0.033** (0.004)	家庭劳动者平均工龄	0.004 (0.008)	工龄	-0.05** (0.018)	0.951	-0.061** (0.019)	0.941
工龄平方	-0.001** (0.000)	-0.001** (0.000)	家庭劳动力数	0.059 (0.048)	工龄平方	—	—	—	—
性别	0.106** (0.028)	0.127** (0.028)	男性比例	-1.047** (0.325)	性别	1.771** (0.516)	5.876	2.04** (0.549)	7.689
就业行业	0.606** (0.067)	0.486** (0.071)	行业	1.067** (0.206)	就业行业	0.322 (0.891)	1.38	-0.377 (0.942)	0.686
进城频率	0.181** (0.033)	0.185** (0.032)	进城频率	0.081 (0.095)	进城频率	-1.69** (0.438)	0.185	-1.723** (0.453)	0.178
土地	0.035** (0.009)	0.033** (0.009)	土地	0.115** (0.031)	土地	-0.209 (0.137)	0.812	-0.233 (0.14)	0.792
电视	0.059 (0.032)	0.054 (0.031)	电视	0.251* (0.101)	电视	0.401 (0.483)	1.494	0.31 (0.493)	1.363
调整后的模型R ²	53.9%	56.33%	—	58.6%	—	37.7%	—	35.1%	—

注:模型 1a 和模型 3a 中的教育以教育年限来衡量,模型 1b 和模型 3b 中的教育是教育程度。所有模型都在 $P < 0.001$ 水平下具有显著性。模型 3a 和模型 3b 标出的决定系数是 nagelkerke R^2 , 其 Cox and Snell R^2 分别为 21.4% 和 19.9%。表中给出的是各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及其模型 3 的机会比率,括号内为回归系数标准误。*表示在回归系数 0.05 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01 水平下显著。

通过表二各模型回归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 傣族农村教育收益率非常低。从模型 1a 中可以看出,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是 0.015,其含义为增加 1 年的教育仅能带来年收入 1.5% 的增加,这不仅低于城镇教育收益率,而且低于其他地区农村教育收益率,令人惊讶的是居然低于工龄收益率!在第二个模型中,与相比,小学教育程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没有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这两组劳动者的年收入与文盲和半文盲组没有显著差异,同时也说明只要有体力、肯干活就能进行农业生产,接受不接受教育都无所谓。此外,以家庭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也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系数却是显著的,其收入比文盲和半文盲组高出 34.9%,这可能和以下将要提到的信息获得能力有关,因为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只有城里才能接收到,此外还可能与非农劳动力市场收入有关。

(二) 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傣族增收有显著的作用。从模型 1a 和模型 1b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以经常进城次数为代表的信息获得水平对农村少数民族提高收入有显著的作用,与不经常进城的人相比,经常进城的人收入高了 18% 以上。以是否经常看电视为代表的信息获取虽然对傣族个人增收没有显著作用但对整体家庭而言却有显著作用。这一回归结果暗示,通过其他途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实现傣族增收的捷径之一。

(三) 其它因素如是否从事农业非农产业、土地投入量、性别、工龄对傣族收入影响显著。在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前提下,不同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存在明显差别。对个人而言,在非农行业工作的劳动者的年收入高于从事农业生产者收入 48.8%-60.6%,对家庭而言,只要家庭中有非农就业人员,其收入就可能高于纯农业劳动者家庭 20.6%。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对个人收入的贡献是 33%-35%,对整个家庭的贡献是 11.5%,而另外一个投入量家庭劳动力对该收入的影响却达不到显著水平,反映了该村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傣族男性收入显著高于女性收入 10.6%-12.7%,但是如果一个家庭里男性过多却对生产不利,

如果男性占家庭人口的比重增加一个单位,那么家庭收入可能降低32.5%,但是这个结果却永远不会达到,因为男性占家庭人口的比重最高只可能达到1。

(四)傣族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收益率不是非常明确。尽管可能有的人为消遣而参与赌博,但除了赌徒外多数人都不喜欢生活在赌徒四处游走的社区或村庄,因为有时赌徒会为了钱而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从回归模型3的结果来看,教育年限对赌博没有显著影响,但初中以上教育者参与赌博的概率高于文盲半文盲组11.44%——年轻人更加喜欢赌博,因为在该村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多数是年轻人。而另外一项代表人力资本投资的进城频率区对参与赌博的概率有负的影响,与不经进城的人相比,经常进城的人参与赌博的概率小4.62(1/0.178-1)倍。其它回归结果表明,年龄越长的人越不可能参与赌博,而相对女性而言,傣族男性却是天生的赌徒。

五、讨论和政策建议

舒尔茨认为在传统模式的农业生产模式下教育的作用很小,教育的作用在现代化农业生产中更有作用。穆克和阿杜(P. R. Moock & H. Addou)对1978年以来研究教育与农业生产相关文献的回顾中也得出了与舒尔茨研究大致相同的看法。^[8]尽管历经改革开放近30年,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依然没有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9]所以国内其它研究也同样得出了农村教育收益率偏低甚至为负的结论。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多数还是属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模式,本文对其中一个傣族村寨的研究也得出了傣族农村教育收益率很低的结论。本文较低的收益率除了与傣族传统农业耕作方式有关之外,还可能与教育质量不高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关。

较高教育收益率必须以保证教育质量为前提。由于该村学生接受教育的学校属于高寒山区学校,教育质量从整体上而言就不如其他地方,加之傣族学生自幼使用傣语,在进入学校的时候适应较为困难,而且傣族家庭对孩子的学习投入比其他民族的投入更低,其家庭教育的传统是“不打不骂”、“放任型”^[10],因此除个别学生以外多数傣族学生学习表现不佳。此外,农村教育中长期存在的以升学为目标的考试导致教育与农村生产生活相脱节,使通过得学校教育获得的知识无法转换为农业生产力,这也可能导致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地区分割,本文得出教育收益率低这一结论的前提是研究对象均在经济落后省份的落后地方从事传统农业劳动。如前所

述,该村劳动力投入量对家庭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有剩余劳动量的存在,如果这些剩余的劳动力能够到较为发达的地区务工,可能会获得较高的教育收益率。遗憾的是该村村民一直在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下憨厚地坚守着他们的那份责任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到发达地方打工,所以本文暂时还无法找到相应的样本来进行实证研究。但是,至少以进城次数为代理变量的人力资本能够带来较高的收益这一事实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但是,教育收益率低并不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傣族农民增收没有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初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优势,另外一个方面是在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不同劳动力市场待遇悬殊,而教育几乎是现代傣族实现这种跨越劳动力市场或者迁移的唯一途径。此外,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却对少数民族增收与建构和谐社会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表明当教育具有多重功能的时候,仅仅用教育收益率来衡量教育功用往往低估或者容易忽视教育收益的复杂性。

尽管上述分析在理论上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文化的、历史的或经济的,对具体的傣族个体而言,在信息较少的情况下,他们总是用自己亲身经历获得的信息来进行个人或家庭的教育决策。当我们用以上的结论反观傣族教育发展的时候,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落后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既然多接收一年的教育还不如多一年劳动经验带来的收益多,他们为什么选择接受教育呢?而且,接受更多教育以后,傣族青年往往面临一个与其家庭割裂的文化,他们可能更加叛逆而不听从父母生产或生活安排,或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因为较少从事农业劳动而使得他们毕业后不愿从事辛苦的农业生产劳动,结果使他们更加容易选择游手好闲、自暴自弃的生活方式,这也可能是家庭支持孩子上学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同时,尽管教育具有跨越劳动力市场障碍的功能,但在傣族地区我们对教育的这一功能的预期不容乐观。因为多数傣族地区教育质量普遍不高,学生成绩表现较差,一方面要考上大学获得进入非农劳动力市场门票的概率非常低。另一方面由于近年出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上大学需要交纳学费等原因,少数民族家庭面临预算约束和成本——收益的理性抉择,这对他们原本就微弱的接收教育的意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可以想象,如果在没有义务教育保证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人选择退学或者不上学。

最后,虽然本研究以一个傣族村寨为样本研究傣族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而得

出的结论可能有失偏颇,但如果考虑到广大傣族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似乎是适合时宜的:

第一,加快傣族新农村建设步伐,使其农业生产逐步从落后的生产方式转变到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以便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

第二,加强傣族地区教育与其生产生活的结合,提高教育质量,真正发挥教育能对傣族农民增收的作用。

第三,重视其他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对傣族增收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加快傣族地区的信息化进程,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第四,发展傣族教育考虑效率固然重要,但更应该考虑教育发展的公平性和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

参考文献:

- [1] 腾星等. 族群、文化与教育[M]. 民族出版社, 2002(10): 156-254.
- [2] 李实和丁赛. 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6): 58-72.
- [3] 岳昌君. 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 2004(10): 135-150.
- [4]、[9] 孙志军. 中国农村教育的成本、收益与家庭教育决策[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0): 45-78.
- [5] 孙志军.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5): 65-72.
- [6] 刀福东等. 云南省25个世居少数民族受教育状况分析[J]. 民族问题研究(人大复印资料), 2005(5): 52-56.
- [7] 孙敬水. 计量经济学教程[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8): 183-209.
- [8] P. R. Moock & H. Addou. 教育与农业生产率[A]. 载 M. 卡诺依编, 闵维方主译. 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2), 162~173.
- [10] 傅金芝. 云南省农村四种少数民族家庭教育的分析与对策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02): 89-96.+++++++6--